



胡小石先生传

门人吴白甸（原名征铸）

先师胡小石先生，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斋名“愿夏庐”之省），晚年别号子夏、沙公。生于公元一八八八年。原籍浙江嘉兴，但生长在南京。一九一〇年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科毕业后，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西北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云南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胡小石

先生毕生致力于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治学态度严谨，条理细密，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谨按时代先后，记其师承关系与学业成就如下：

一

据师自述：年十岁，父季石先生即命诵读《尔雅》，期望其他日成一学者。季石先生出兴化刘融斋（熙载）先生门下，刘虽以《艺概》一书得名，但非一般词章家可比，其治学方法实属仪征阮元、焦循一派，与乾嘉戴东原学派一脉相承，即以小学为基础，进而研究经、史、子、集。师毕生从事古文字学，推本溯源，应是幼年即受到家教启发。一八九八年父歿，家贫，母以络

丝所得给膏火资，就读私塾。一九〇六年，考进两江优级师范后，开始从临川李梅庵（瑞清）先生为嫡传弟子。今日文艺界只知清道人（梅庵先生晚年别号）是位书法家，却不知在清代末年，乾嘉诸老严谨的考据方法已从治经、治史、治诸子发展到考订金石文字方面，而梅庵先生是其中最精深突出者。据师自述，他治小学与今文公羊学的门径方法都是经梅庵先生指授而得来。

在两江师范期间，师怀抱“科学救国”志愿，选择农博科作为专业，从日本教习学了生物、矿物、地质、农业等课，因此，接受当时传人的科学方法，着重分类与归纳，尤其当时盛行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师受其影响极深，多年来以达尔文主义为指导思想。一九〇九年在两江毕业后，直至一九一七年，师为中学博物教员，在采集动植物标本中，不断发现日本人所定我国动植物名称不妥之处，要根据《说文》《尔雅》加以改正，就此对考订之学产生浓厚兴趣，努力钻研，终身不懈。也从生物学角度，倾佩乾嘉时程瑶田先生所作《九穀考》的治学方法，经过实地调查考察，辨证，《周礼》“九穀”之名实，论点精确，启发很大。因此，师所作考订，除坚守乾嘉学风“无证不信”外，特别注重对实物的调查研究，核对文献资料，务求互相印证，得到比较准确之结论。

经梅庵先生介绍，师拜义宁陈散原（三立）先生门下，从受诗学。众所周知，陈先生是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之一，作品面貌颇似宋诗；实则对于历代诗歌源流演变和大小名家创作方法及其特长特色，理解、剖析皆非常深透，并非只言宋诗者。师曾对我说：“散原先生从不教人专学宋诗，也不要人学他的诗，主张各就性情所近，从一体一家入手，继而摆脱陈言，博采众长，终于成就自家面目。”由于受此指授，师既能研究，又能创作，在讲授文学史和专家诗选时，不仅能从历史角度指出来龙去脉，而且能从艺术角度说出诗人甘苦；所作诗词，能自成风格，并不蹈袭散

原先生。

一九一八年初，梅庵先生延师至上海寓所，为其家庭教师，直到一九二〇年秋，梅庵先生逝世后，师始离去。常云：“此三年中，受益最大，得与梅庵先生朝夕晤谈，小学、经学和书艺能不断深造，并得良机，向旅沪诸老请教。特别是能师事乡先辈沈子培（曾植）先生，最感庆幸。”沈先生学问极其渊博，记忆力过人（能背诵全部《资治通鉴》），于小学、经学、史籍、诸子、佛经、道藏、诗词、书画、金石之学，无所不通，师往叩以疑难问题，沈先生常能凭背诵原文或指点出处随作解答。核对原稿，不失毫厘，使迷惑顿时可解，沈先生博学而著述甚少，尝谓师云：“嘉兴前辈学者非有真知灼见，不轻落笔，往往博洽群书，不著一字。”师深受其影响。读书方面甚广，钻研功夫甚深，而发表文章不多，凡有心得常作礼记，或书于简端、或书于小笔记本，甚至书于片纸上，往往寥寥数语，启发性甚大，有非他人千百言所能到者。惜身后不久即遭十年浩劫，散佚殆尽。

二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受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聘为教授兼中国文学部主任，所授课程有中国文学史、诗选、散文选等。以文学史一课最受诸生欢迎，此后以文学史学驰名各大学讲坛，几十余年。盖在师以前，虽亦有文学史专书存在，或失之材料芜杂，或失之见解偏颇，未能做到史观明确，条理清晰。先生出面纠正之，根据清焦循《易余籥录》“一代还其一代所胜”之说，于周代取《诗经》三百篇与金文中之韵文，于战国取《楚辞》，于两汉取乐府辞赋，于魏晋南北朝取五言诗，于唐取五言七言古近体诗，于宋取词，于元取曲，于明清取南曲，小说与弹词，主张文学随时代而不断发展，既有继承，复有独创。叙述源流正变，有条不紊，重点突出，方便后学甚大。其立史观，则根据达尔文

《进化论》。其定文学范畴，则以我国固有之“言志”说为主，结合外来之“纯粹文学”理论，今日视之，属于资产阶级观点，而在民国初年当时，则有其一定的进步性，非老师宿儒主张“选学正宗”或“桐城义法”者所能及也。至于治学方法，则严格区分治史与学文为两途，治文学史属于科学范畴，必须实事求是，无征不信，通过对具体人物及其作品，作具体的深入分析，归纳而得结论，不得以个人爱憎为去取褒贬，亦不得步趋时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炫世骇俗。由此可见，是能融合清儒考据与西方历史科学于一炉者。初只有讲稿，未尝有意出版。一九二八年初，闻有某君取学生笔记去，意在剽窃成书，据为己有，师不得已，仓促间取同学苏拯笔记，加以审核，自上古至五代，用《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篇》题名，付上海人文社排印发行。书既出，为国内学者所重视，称其“篇幅不长，颇具卓识”（余冠英先生评语）。继起以文学史得名者如冯沅君、陆侃如二先生合编的《中国诗史》，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实皆受其启发，加以扩充而成书，冯刘两先生固皆先生弟子也。

三

师致力于楚辞之学，亦在北京开始。综合旧闻，择善而从，复自出手眼，独创新说。其阐明屈子之心迹，则具史家之卓见。如论《招魂》，则根据《史记》本传，断为出于屈子之手无疑，出于宋玉之说为后起。其所招之魂为楚怀王，非楚国之魂，亦非自招，因从此篇本身内容看，魂归来后，给以多种享受，其隆盛奢靡程度，与当时妻妾制度，非屈子身份所能担承，唯楚王始能享有之（解放后，师曾为研究生言，“怀王身份应是大领主”）。如论《离骚》，则谓屈子始终忠爱君国，志在入世，上下求索，终乃眷恋旧乡。如论《九歌》，则谓其内容有人神相恋，仍属屈子所作，非当时民歌所能有。凡此大体皆根据旧说，加以补充，只

在教室讲授，未发表专文。其已成文而发表者，最早有一九二六年发表于《金陵光》学报之《远游疏证》，用清代经师考据之法，根据廖平尝有“《远游》与司马《大人赋》大同小异”之说。“细校此篇十之五六皆离合《离骚》，其余则或采之《九歌》、《天问》、《九章》、《大人赋》、《七谏》、《哀时命》、《山海经》及老、庄、淮南诸书。又其词旨诙诡、多涉神仙。疑伪托当出汉武之世”。其次为一九四〇年写定之《楚辞郭注义征》，则用清儒辑佚方法，根据《晋书·郭璞传》所云郭氏曾注《尔雅》、《三仓》、《方言》、《穆天子传》、《楚辞》、《子虚赋》、《上林赋》数十万言。其后《隋书·经籍志》著录楚辞郭注三卷，新旧两唐书《艺文志》著录楚辞郭注十卷，而宋以后诸著录书皆无之，断定楚辞郭注亡于唐季之乱，唯存其目，然而“所注他书，如《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诸注皆在，其所为《尔雅》《山海图赞》及《三仓》《子虚》《上林》诸注亦往往散见群籍中。……若夫名物训诂之说，则就现存诸书中求之，其义涉楚辞者，为证实繁，……”。因仿闻一多先生据敦煌所出隋释道骞《楚辞音》残卷，勾稽出《楚辞郭注》三条前例，遍查现存群籍中所引郭注《楚辞》遗说，细加收辑，共得二百四十余条，汇集成篇，由是而郭注面目，约略可知矣。师研究《楚辞》之作，其已定稿，有油印讲义而未出版者，有《楚辞辨名》、《离骚文例》。解放后，师接受历史唯物论观点，于一九五六年，用以讲《屈原与古神话》，分两部分：（一）古神话一般问题；（二）屈原与《天问》。其中最主要论点为中国古神话反映出中国古代人民最优良的品质。凡是为我国人民所歌颂，所喜爱的神和英雄，必须具有以下条件：1.能征服自然灾害，为民造福，对于一切困难不低头。2.不断劳动，以群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3.毫无宗教的柔软怯懦性，永久斗争下去。4.斗争到死不休，可以把事业传给子孙，斗争者遗物也可以发展壮大。5.对上帝

常常不满，与统治阶级反抗，对旧制度憎恨抗争，而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被压迫者。此为师研究楚辞之最后论文；足以证明其思想之转变。师治楚辞之学，前后四十余年，晚年拟将零星考证，琐碎诂释，独特见解、以及文艺赏析等等，汇集为《楚辞札记》若干卷，几经选择，未及定稿而卒。尝云：“初从事研究，自负颇有心得可讲，后来研究愈深入，乃觉问题愈多，不敢轻下断语处愈多”。札记所以迟迟不能定稿，正可见吾师治学之一丝不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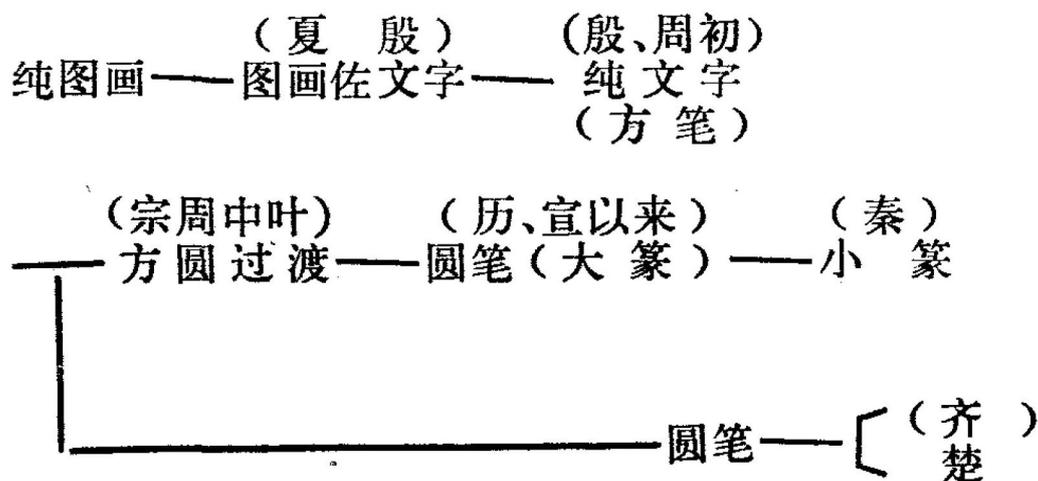
四

师毕生治古文字学，考订金文，始于民三年在上海时。钻研甲骨文字，则在北京开始，距王懿荣最初发现殷契，已隔二十余年。当时名家专著问世者不少，先生所服膺者，唯孙仲容（诒让）先生之《閔通》与王静安（国维）之《精审》。王曾总结吴清卿（大澂）、孙仲容诸家古文字学成果为四条：1. 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2. 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谊例；3. 参之古音以通其谊之假借；4. 参之彝器以验其文之变化。师毕生治古文字学，恪守此四条不渝，盖融合经学、史学与小学（包括形体、音韵、训诂三端）于一炉、以推求究竟，期其确凿可信，非浅学之士，仅执形体一端，附会穿凿，而欲求一字之无不识，一谊之无不通者所可同日而语也。其成就犖犖大者如下：

（一）属于甲骨文者，一九二四年左右，成《甲骨文例》二卷，于金陵大学初讲甲骨文时，以油印本授诸生，实为契文之学开一新路。前此学者率皆从订证个别文字出发，谓其形象某物，为某字而已。师乃进而从全篇出发，研究其书写款式、语法修辞，与章句段落，分为若干常例，由此考订一字，可以根据其上下文，而得其谊，再根据音义相关之理，由训诂通假推定其读音，其可信之程度倍增矣。后此篇之出约十年，中央历史研究院董作宾先

生复根据发掘殷墟所得新材料为文，增改上卷，师见而赞许之曰：“考据之学后人自当超过前人，以其掌握材料，多为前人所未见也。董君能见全龟，据有第一手资料，非余只能见破碎甲骨残片者所能及”。于此可见吾师实事求是之精神，然而，师开导先河之功终不可泯。除《文例》外，师唯作《卜辞中之☱即昌若说》一篇，发表于中央大学《文史论丛》期刊。此文可补王静安先生《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之缺。其他创获只于讲授中言之。汇集为《读契杂记》，未发表。

(二)属于金文者：师继《甲骨文例》后，成《金文释例》一卷，其宗旨与体例相同，只有油印讲稿，未发表于期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表《古文变迁论》长文于中央大学《文艺从刊》第一期，体大思精，条理明晰，根据实物，参合经史，以纠正当时流行的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之假定，实为吾师研究古文字学之代表作。其首创之论：1. 甲骨文有形声字，有通假且有长段文字，其时代属于殷中叶以下，自盘庚以至于帝乙之时，文字已使用成熟，不能称为最早文字。铜器铭文中以图画佐文字者，早于卜辞。2. 文字成熟可分纯图画，以图画佐文字，进而至纯文字，三期。3. 铜器花纹之变化，与文字之变化相应。4. 文字形体最初为方笔，后变为圆笔。综合以上论点，可成一表说明古文变迁之系统如下：



师又赞同吴大澂说，以许慎《说文解字》所列“古文”出于战国人手，大率与齐器文合。

一九三四年六月，师发表《齐楚古金表》于《国风》半月刊四卷十一期，为《古文变迁论》作补充说明，谓“古今文字派别约有四途：……一为殷派，其下笔如楔而方折，是分两期：文少不过数名，而恒杂图绘以表意者属前期，此中每多殷前之器，欲求夏代文化者当于是求之；文多至十余名或数十名而不杂图绘者则率见于殷末，殷墟甲骨殆与此相当。其文多至数十名或百名以上者，则率在宗周初叶，其书犹守前代方劲之风，是为后期。……二为周派，其书温厚而圆转，结体或纵或横而使笔多不甚长。此体起于西周中叶以来，自王朝以至诸同姓国皆尔。……其三为齐派，其四为楚派，两者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结体多取纵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尚平直而流为精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弯曲而流为奇诡，两者盖又各有其前后期矣。……鲁地近齐，其末世之书，亦入齐派，故孔宅壁书诸经，实亦齐派文字。……”。凡此诸论，多发前人所未发，启发性甚大。

（三）属于音韵训诂学者：一九三七年八月，师竭数年之精力，钻研声音与训诂之关系，成《声统表》上下卷。发表于当时发行之《金陵学报》，其自叙曰：“训诂之指，存乎声音，此为近世治小学者所必诵之律令，故古韵之学盛焉。实则音义相生，其所主在声不在韵。观古今异语之生，皆韵变而声不变。古言‘离娄’言‘丽楼’，今言‘玲珑’，言‘伶俐’。（下面还举六例，从略。铸注）韵有百殊，声无二致。大底发声同者，义必相近。言古韵部分合者，自宋迄今，惛然有多歧之苦，然反求声，则若网在纲。故今之治训诂者，识声斯可矣。近儒皆言韵有相转之理，不知声亦有相转之理。含生之伦，凡以口发音者，其最初但有喉与唇而已。（下面列举禽兽鸣声，七例为喉音，三例为唇音，从略，铸注）其以齿舌鸣者极鲜。人之始生，发音唯喉，故其泣

则呱呱，及其有知，则先以唇，故孩提学语，首呼父母。舌齿之音，人繁于鸟兽，然皆后于二者，古音亦但有喉唇而已。今定声转之统系有二途：一为递转，凡舌齿音，多以喉为初音，由喉转入舌，次转入齿，至齿不更转，其式如阶，此一系也。一为对转，喉径入唇，唇亦径入喉，其式如两极，此二系也。（原每系下均有双行夹注，列证颇多，兹从略。）兹先就许书（《说文解字》）证其转易，其有所得列表明之。上卷述递转，下卷述对转。言声母多音者，于此可睹其条贯耳。”按清儒与近代学者于音韵之学，远过前人，但治古韵者多，成就较大。以古韵分部论，由段玉裁之十七部，发展为章太炎太老师之二十三部，至黄季刚师之二十八部而最精密，集其大成。以古韵通转论，自章太老师之《成韵图》出，而轨辙大明。若夫古声之学，则自钱大昕古无舌上、轻唇音，章太老师娘、日二纽归泥，季刚师古声十九纽，曾运乾喻母三、四等分归匣、定外，成果不显。吾师此表，谓“音义相生，其所在声不在韵”。“古唯喉唇两音”，可以“递转”“对转”，实为一大发明。本此规律，与古韵学参合而用，则我国语言自上古至现代之演变与各地地方言之分歧，其脉络条理均可一一说明之矣。师晚年著《广韵正读》一书，其体例以《广韵》（中古音）所载反切为标准音，对照所收集之现代各地方言（其中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四川者较多），用声母递转、对转之理，解释其产生变易之原由。此亦为开径独行之学。惜只成平、上、去三部分，未及入声而去世。遗稿经同门段熙仲兄审阅后，送还南京大学遗著整理委员会。未几即遇十年浩劫，存亡今不可知。

（四）关于《说文解字》者；在解放以前，师惟讲甲骨文、金文两课。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始为南京大学研究生讲《说文解字》部首，董理讲稿，成《说文部首疏证》一书。原稿虽亦遭十年浩劫而遗失，幸省文化局局长周邨同志曾向师借阅，录一副本，得以保存。师谓：许君作《说文解字》之功诚不可没，吾辈生

三千年后而识三千年以上之文字，以通其语言，惟赖此书为攀陟之阶梯。然其所收之字，以小篆为主流，兼采古籀。考其所采古文，多出自孔宅壁中书，然以今日所见殷及周初之实物刻文证之，什九不合。同意清吴大澂指出壁书古文为战国文字，疑许未见金文之说，并发现壁书古文以形体言，多与晚周齐器铭刻相近。因此，许书分析形体不少伪误。然而许究生在二千年前，其通古音古义，自远非今人所能企及，因此，许所言本义本音又多不误，为治训诂音韵之学者所必依据。总之，师治许书，既不同于清儒之视为经典，不敢非议一字，亦不同于今日学者之横加抨击，否定全书，乃综合甲骨、金文、音韵、训诂之学而作实事求是之论断焉。

五

一九一〇年春，师自两江师范毕业后，留附中任教，时陈散原（三立）先生旅居南京，李梅庵先生特介绍胡翔冬师与师同拜门受诗学。散原先生因才施教，命翔冬师专习中晚唐五律，师专习唐人七绝入手，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以故师生平讲诗学，最长于剖析唐人七绝。一九三四年曾为金陵大学研究生专设一课，首作引论，言我国诗歌，擅长于短篇中见其机趣，而七绝最妙。其源流正变，始于刘宋汤惠休之《秋思引》，自南齐永明以后，逐渐采用律调，其内容乃当时宫体。不离闺情，至唐人扩大范围，方尽其能事。唐乐府诗可以被之管弦者，往往为七绝诗，实为“词”体之祖。七绝以抒情为正格，以叙事议论为变格。次论唐七绝句正格，自显而隐，分十六格，各举一名作为首例，下录同格者若干首附之。论严羽《沧浪诗话》，其主情趣，云“言有尽而意无穷”则是，至云“无迹可求”则过。谓“人具七情，应物斯感，既来自应物，则有迹可求，有迹可求，则可以分析而得之矣”。十六格中，第一至第五格为对比今昔，第六至第八格为对

比空间差别，第九格为超过因果关系，第十格第十一格为设问答，第十二格至第十四格为假设想象，第十五格为事物之人格化，第十六格为意在言外。最后附唐人习用三字之名词押末句韵脚，以求重点突出，音节铿锵一法。经此解剖，七绝诗作法大明，乃极便于鉴赏与追摹矣。又次讲七绝变格，所选为杜甫诗数十首，择要言之，最后以王建、王涯宫词与曹唐小游仙诗大篇叙事诗作附录备参考。师尝云：“唐人七绝诗以青莲（李白）龙标（王昌龄）为最高，然极不易学，可学者为刘（禹锡）白（居易），学李义山（高隐）亦可，稍嫌晦耳”。又云：“王渔洋（士禎）‘神韵’之说，近乎玄妙，其实不过谓文字有限，而文字外之意味无穷也，然渔洋所作多袭唐格之浅显者，观《秦淮杂诗》诸作可知已。”谨按师生平所作诗，七绝最多，散原先生尝赞其“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非虚誉也。

舍唐人七绝诗外，师曾讲陶、谢诗与杜诗。已发表之论文有《张若虚事迹考略》、《杜甫北征诗小笺》、《杜甫羌村诗章句释》等篇。所作古体诗，初学宋谢翱，上追大谢，又喜六朝乐府，前后作《杨白花》多篇，五七律则师王维，间及义山，风采高骞，气息醇厚。自经倭乱，感时伤世，愤乱疾邪，则多法杜甫。晚年曾将所作诗词厘为六卷：卷一题《磐石集》存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前古今体诗；卷二题《峡林》存抗战初期旅舍重庆古今体诗；卷三题《无同沙语》存一九四一年移家江津县白沙镇以后古今体诗；卷四题《蜩楼草》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家返南京以后古今体诗；卷五题《东风堂集》存解放以后古今体诗；卷六题《夏庐长短句》存毕生所填小令词（无长调）。一九六二年初，师逝世后，遗稿除三、四卷有亲笔定稿，六卷有曾宪洛钞本外，余皆未定。其次子白华兄（出继外家，改姓杨氏）广为收罗，始成诗词全集，寄中华书局，当时国营出版社尚无印行现代人旧体诗词集之成例，退稿交南京大学遗著整理委员会。未几，即罹十年

浩劫，下落不明。白华兄亦身受横逆，含冤逝世。一九七二年，铸发愿重行搜辑，数年来从师家属与同门弟子处以及各种报刊上钞得古今体诗二百五十一首，词十九阙，约存全貌之半，而昔日所见师在重庆谴责蒋帮之《领事巷诗》五古十首，与解放后庆祝国庆十周年七律四首，可以说明吾师政治大节者，皆未搜得，至可恨也。现将此钞先附印文集之后，自当继续努力，四出访求。

六

师习书法，治书学史，历时甚久，造诣甚深，而遗作所遭劫运甚酷。初拜李梅庵先生门下时，即立志学书。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在梅庵先生家，朝夕亲炙者三年，梅庵先生当时书名播海外，考订金石，鉴别书画，众推巨眼，登门求教者不绝，师侍座侧，尽得嫡传。复又亲接沈子培，吴昌硕诸老，见闻益广。往往继梅庵先生所作题跋后，自书心得，可于当时石印《金石番锦集》中见之。梅庵先生下世后，师历任大学教授，因各大学不设书法课程，未作讲授。直至一九三三年，金陵大学成立研究班，师始创设“书学史”课，亲授一次，此后即未重开。一九四三年在昆明，应西南联大之请，《书学史》专讲“汉碑流派”一章，其要旨如下：“汉碑面貌，变化多方，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一同者。若以用笔之轻重，结体取势之纵横，与夫整个风格之奇正险易分之，大致可得十五种，每种以一碑为代表，则有①张迁，②景君，③礼器，④华山，⑤乙瑛，⑥孔宙，⑦曹全，⑧刘熊，⑨鲁峻，⑩史晨，⑪三公山，⑫石门颂，⑬王稚子阙，⑭三老讳字忌日记，⑮裴岑。每种各有眷属，取其风格近似，不计时代先后，如论张迁派，则先举其纯用方笔，取正势，其眷属有校官碑，张寿残碑，鲜于璜碑，与衡方碑，其后吴谷朗碑晋爨宝子碑皆其支派，故张迁可称南派汉碑代表。”（其论他派体势皆同此例，不一一具引。）当时联大名教授若汤用彤先生、罗常培先生等皆在座静听，

盛惊其专精独擅，非积数十年钻研不能到也。一九六〇年，江苏省文联邀师作书法讲座，讲《书艺要略》，内容分：1. 文字变迁；2. 八分在书艺上之关系；3. 学书诸常识（分用笔、结体、布白三大端）。全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其最后结论曰：

“染翰操觚之士分道扬镳，或尚摹仿，或主创造。夫学书之初，不得不师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临古所以成我，此为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也。若拘守一隅，惟旧辙是循，如邯郸之学步，此等粥饭汉倘使参访大德，定须吃棒遭喝，匍匐而归。至于狂禅呵骂，自诩天才，奋笔伸纸，便夸独创，则楚国失矣，齐亦未为得也。

尝见昔人赞美文艺或学术成就之高者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语割断历史前后关系，孤立作家存在地位，所当批判也。今易其语曰，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不识贤者以为何如？”此一结论益深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之精神实质，亦可概括吾师一片治学作文之宗旨矣。一九六一年，应江苏省委宣传部之建议，开始写《中国书学史》，以晚年研究生侯镜昶为助手，写至二王书而宿疾作，一九六二年初遽归道山，未能完稿。南大成立遗著整理委员会，命侯君为秘书，管理全部资料。以有关书学史全部讲稿札记与同门游介眉兄（女，今为哈尔滨师大教授），笔记交同门曾昭燏兄（女，为南京博物院院长），由其共同整理成书。一九六四年三月，曾患严重失眠症，铸往探问，昭燏曰：

“自度精力衰竭，恐不能为师完成此书，拟将全部资料送交侯君继续整理”，次年初曾即逝世。未几，十年浩劫起，遗稿之存于南大者，不知为何人抢劫而去，仅存空箱。“四人帮”粉碎后，遗著整理委员会恢复开会，铸以书学史事询诸侯君，侯云：“曾院长没有交我。”辞色坚决，曾既身死，又无后裔，乃真成无可对证之疑案矣。

师本家书法，取精用弘，自成面目，前后可分三期：①师曾

曰：“少时初临颜书，陷于板滞。经梅庵先生指授笔法，改学北碑，得力于郑文公、张黑女，于郑取坚实严密（《书学史》称郑北书第一），于张取其空灵秀美。其时西陲流沙坠简初出，师以为学古人最好的墨迹，即取其印本肄习之，而八分、章草、行草书得汉人真相，迥异时流。此为第一期。②第二期始自一九二六年左右，始改署款“炜”字为“燁”，铸已入门下，常得亲见其染翰，闻其绪论，师日有字课，于金文则兼临周前期方笔，后期圆笔，与齐楚两派文字，小篆临秦权诏板皆用梅庵先生法，行笔有顿挫。隶书八分，则以张迁为主（因此《书学史》论汉碑流派首举张迁），旁及各派，后得新出土之马姜碑，喜其矫变，亦临多次。尝论清代学张迁者，以道州（何绍基）、汀州（伊秉绶）为最有成就。师自道州人，服其能运顿挫空灵之笔，由貌似而至于不似，每临此碑，辄有“不能忘道州”之叹。真书常临钟繇戎路帖，以其虽出后摹，仍保存较多之分势，又常临梁贝义渊之萧憺碑与萧秀西碑阴以及隋董美人、常丑奴两墓志。虽在《书学史》中推崇唐初四大家，而从未作临摹，从其结体以整齐为当，逊于梁隋碑志有自然之天趣也。行草书临王献之，兼临宋苏、黄、米三家，皆取其有创造性，最赏米书“刷”字诀（按米谓他人书皆描字，自书为刷字）。其论明人书，则谓“明人皆精帖学，中叶如祝枝山、文徵明虽有成就，未能脱唐人钟、王之成规。至晚明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诸家出，始能摆脱藩篱，别开生面，而董书实为明书第一，以其楷书以丑为美，行草着空意多，着纸意少，以虚神替实笔，在书学史中为首创也。”又谓：“明末华亭（董）、善用柔，石斋（黄），鸿宝（倪）善用刚。每欲为两派沟通之”。又谓“清人悞于馆阁体，整齐匀称如标子，尽失天趣，为书家大厄。行草则董书影响一代，其能遗貌取神者，唯刘石庵（塘）八十以后书、何道州、伊汀州三家而已。其不受影响者仅邓完白（石如）一人，足称豪杰，

惜所见汉晋墨迹不多，其篆学汉碑额，隶楷学唐人，未免有所局限耳。”于此，可见师陈义之高，自励之严与致力之勤。是为第二期。③第三期始于倭乱中移家白沙之后，署款多用“沙公”或“子夏”，为其书法成熟期，年事逾高，笔力愈强，破空杀纸，真得米氏“刷”字诀。其最大特点在以碑体方笔作二王体书，结体布白，有来源亦有变化，在似与不似之间。昔日师曾云：“何道州临张迁碑凡二百数十通，每通记数，前数十通不似，中数十通甚似，后百余通又从不似至大不似，乃尽化张迁为道州”。吾师晚年所临碑帖亦臻此境，铸所见有其在云南所书正楷二大碑，及各体书匾额、楹联、屏条卷册无数，皆独具本家面目，其学问诗文风度，与接人待物、喜怒哀乐之情亦可于书法中见之，环视当世，能臻此境者寡。自遭十年浩劫，遗迹多为“破四旧”焚毁，所存无几，良可悲矣！

七

综观吾师一生，学极渊博，兼为文字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当之无愧。其最大特长，在于独出手眼，既能继承前人，总结经验，又能开创途径，启发后进。虽以律己甚严，不轻易著作，而诲人不倦，及门弟子受其培育，在学术文艺上能卓然自立者实繁有徒。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从不阿谀取容。初不问政治，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愤蒋帮之误国，常有愤世嫉俗之辞，为蒋帮所忌。在昆明时，从友人郑君处，得马列主义书籍数种，读而善之，携以返川，为特务搜去，从此名列黑籍。淮海战役后，蒋帮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师挺身而出，与梁希先生同率学生护校，与之对抗。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亲率学生至伪总统府请愿，伪军挺刃交下，学生死者二人，师亦险遭不测。南京解放，日月重光，党中央重师之为，在政治、文教界各方面畀以重任。先后任江苏省人委、政协及省文联、作协、书法印章研究会、

委员、常委、副主席、主席等职。师学习甚勤感党与政府知己之深，誓以毕生之力献诸人民，并争取入党。有愿未伸而歿，惜哉！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至八日，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个民族七十七名代表。

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任英同志主持大会，副组长李鸿雁同志向会议汇报两年来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副组长贾春光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继续抓好组织、规划、措施三落实。他还谈了下面几个问题：1. 要制定长远规划和短期规划。2. 要加强力量的组织和人才的培养，要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调动和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同时应立即着手培养新生力量，将委托中央民族学院开办“民族古籍整理专业进修班”。有条件的省、自治区也可举办各种类型的进修、培训班，多渠道地培养人才。3. 关于协作与出版问题，为了节省人力财力，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跨省、区的古籍协作势在必行。民族古籍的出版，在一段时间内，还要依靠各种现有的出版力量。4. 关于经费问题，要按文件执行，应纳入各地方预算。全国民族古籍小组的专款经费，主要用于人才的培养和重点项目的资助。

• 鸿雁 •